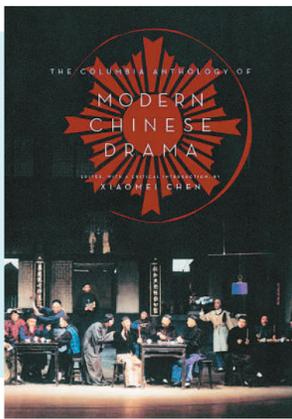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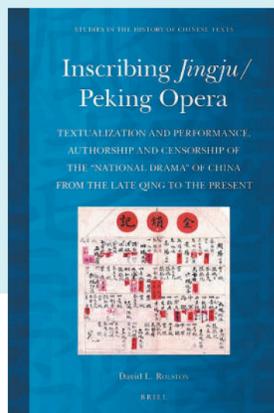
欧阳予倩：戏剧理论实践远播海外

张清芳

欧阳予倩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界的“通才”，在早期话剧、戏曲、电影的剧本创作、导演和舞台表演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0世纪20年代前后，他还在中国京剧界享有“南欧（欧阳予倩）北梅（梅兰芳）”的美誉。在推动戏剧改革以及戏剧教育等方面，欧阳予倩做了大量工作，田汉曾盛赞他是“中国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的一座典型的金桥”。欧阳予倩的戏剧理论与实践不仅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传播。



▲陈小眉主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



▲陆大伟著《京剧题记》

早年投身“文明戏”

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首演文明戏（初期话剧、白话剧），欧阳予倩看后产生参演戏剧的兴趣。之后，他加入春柳社，同年6月参演五幕剧《黑奴吁天录》。该剧演出成功，日本《读卖新闻》《东京朝日新闻》《报知新闻》等刊载了相关报道。1907年7月，《早稻田文学》登载的文章中，日本戏剧评论家伊原青园肯定该剧“背景独具匠心，舞台整饬统一，演员演技熟练，在这些方面恐怕日本的业余戏剧也稍逊一筹”。该剧也获得中国留日学生好评。同年，《演艺画报》7月号上登载了两张标题为“本乡座中国留学生演剧《黑奴吁天录》”的照片。此后，欧阳予倩在日本又参演了《鸣不平》《热血》（演出时改为《热泪》）等文明戏。

春柳社演剧经历成为欧阳予倩戏剧活动的开端，是他形成戏剧既有审美性，又可“借此以作爱国的宣传”现代戏剧观的开始，这也成为他回国后始终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对中国戏剧改革的原因之一。

海外最先推介和评价欧阳予倩日本留学期间演剧活动的，是美籍华人翻译家梁社乾。他1936年发表《中国当代戏剧》，在介绍中国话剧发展情况时，涉及春柳社、北平艺专等多个团体的演剧活动，还介绍了包括欧阳予倩在内的一批中国戏剧家。1996年，美国华人学者邵勤在英文文章《错配：欧阳予倩和南通的戏剧改革（1919—1922）》中详细分析了欧阳予倩的这段经历。1983年，美国学者耿德华主编的英文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史》与2010年美国华人学者陈小眉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分别介绍了欧阳予倩在日本的演剧情况。其他英文论著也涉及这些内容，如2010年美国学者卡罗琳·菲茨杰拉德的文章《战时鸳鸯派：欧阳予倩对娜拉和木兰形象的改造》，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薇薇安·沈于2005年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国左翼电影的起源（1932—1937）》、凯文·亨利2020年的专著《五四和翻译》等。

日本学界则伴随着春柳社研究的兴起而关注到欧阳予倩。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相关研究论文，主要有滨一卫的《关于春柳社的〈黑奴吁天

录》、中村忠行的《春柳社逸史考》、近藤忠义的《新派剧与中国话剧》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春柳社研究再次出现，近年来，饭塚容、濑户宏等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多涉及这方面内容。

濑户宏2005年出版日文专著《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高度评价欧阳予倩参加春柳社是其开展中国话剧活动的良好开端，“此后，欧阳予倩为中国话剧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书前七章在论述文明戏演变发展历程时，多次引用欧阳予倩在1957年撰写的两篇回忆录《回忆春柳》《谈文明戏》中的观点，认为“欧阳予倩在回忆录里提出的观点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站在话剧运动立场上对文明戏进行评价的集大成者”。可以说，欧阳予倩在日本的这段演剧经历成为海外学界研究文明戏的必备资料之一。

推动戏剧改革创新

1910年，欧阳予倩回国后投身新旧戏剧表演，并从事话剧创作、改编和革新工作。他一边编、演话剧，一边在五四新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自己的现代戏剧观及理论，即推动戏剧改革创新，且要吸收中国传统戏剧精华而使文明戏与话剧得以“中国化”。1929年，他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社所实践了这种话剧观，在近3年时间里培养了为社会服务的话剧人才。

梁社乾于1936年的英文文章《中国当代戏剧》中就包括对广东戏剧研究社及其演剧情况的介绍。意大利学者莱蒂齐亚·富西尼在英文文章《创新还是更传统？——五四时期的中国传统悲剧观念》中，把欧阳予倩1928年的文章《戏剧改革之理论与实践》作为体现中国话剧悲剧观的一个代表作。

1940年，欧阳予倩任广西艺术馆馆长并兼任戏剧部主任，戏剧部还附设话剧实验剧团。时值抗战期间，他在桂林继续推进对话剧的改革创新，并将其与反侵略斗争相结合。加拿大历史学者戴安娜·拉里2010年出版英文专著《战时中国人所受苦难与社会变革（1937—1945）》，专门提到1942年—1944年在桂林时，欧阳予倩在话剧中曾讽刺投降日本的汉奸。

1944年2月，以“戏剧为抗战服

务”为方针，欧阳予倩和田汉等人集合湘、桂、粤、赣、川、滇、鄂等地30多个戏剧团体的上千名戏剧工作者，冲破重重阻力，召开了影响深远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史称“西南剧展”）。剧展历时约3个月，演出爱国剧目数十部，观众达10万人次。同年，美国剧评家爱金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这次规模宏大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古罗马时代曾经举行外，还是仅见的。”

欧阳予倩在话剧领域的突出成就，使海外也公认他与洪深、田汉并称三大中国话剧先驱。他于1927年的代表作五幕话剧《潘金莲》，被耿德华译为英文并收录于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选》，陈小眉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则收入欧阳予倩1922年创作的独幕话剧《回家以后》，认为它是“最早描写归国华人的戏剧之一”。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博士安美珍在2019年撰写的英文文章《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欧阳予倩的〈黑奴恨〉和角色扮演中的种族、性别和阶级的策略》探讨了欧阳予倩在1959年创作大型话剧《黑奴恨》的情况及其中国演员的表演策略等。这些都表明欧阳予倩的话剧活动在海外产生了长久影响。

旧戏改革成就获认可

欧阳予倩从小就对中国戏曲很感兴趣，早在1909年，他就向春柳社成员学唱青衣。从1916年成为职业京剧演员到1927年，欧阳予倩共自编自演了二十余出京戏，撰写、改编了8个京剧本。1914年—1917年，欧阳予倩根据小说《红楼梦》自编自演了十几出颇有新意的“红楼戏”，因扮相清丽雅致，与梅兰芳《黛玉葬花》等红楼戏中高贵雍容的青衣形象遥相呼应、平分秋色，成为一时佳话，遂有“南欧北梅”之誉。这种声誉也使欧阳予倩在1919年受邀赴江苏南通主持伶工学社（中国成立最早一所培养京剧演员的新型戏剧学校）和更俗剧场。这为他实现旧戏改革理想和培养新式戏剧人才提供了可能。

邵勤的研究还原了欧阳予倩

1919年—1922年在伶工学社进行京剧改革时遇到的困难，认为其“揭示出传统流行文化对现代文化形式侵入的抵触，折射出现代中国所经历的阵痛”。陈小眉在《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戏剧选》的“导言”中同样把欧阳予倩作为京剧改革的一个先驱。2012年，学者沈静（音）的英文文章《戏剧中的女性主义：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红楼戏”的比较》，把这两位京剧大师进行比较，“特别是调查了两人所扮演的角色形象（表演艺术、服装行头、戏剧道具和舞台装置），力图阐明他们对京剧的特殊贡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恰逢中国戏剧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梁社乾相继撰写《新潮传统戏曲的新趋势》《中国戏剧的逆流》《今日粤剧》等英文文章，认为尽管中国戏剧应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但是也欢迎“有节制的革新”。他把“好嗓子”的欧阳予倩看作是能把京剧“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密切结合起来的代表性人物。兼具演员和剧作家身份的欧阳予倩从日本回国后，成为剧艺进步探索的先锋。而京剧《潘金莲》中潘金莲对武松的告白，是其剧作贯穿现代意识并极具感染力的体现，堪为当时北京剧坛的过渡戏树立了榜样。这些文章为推动中国戏剧走向世界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欧阳予倩的京剧演剧活动只有十多年，近年来他在海外产生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古典戏曲改革文章上。2021年，美国学者大卫·罗尔斯顿（陆大伟）在英文专著《京剧题记》中大力赞扬欧阳予倩在京剧领域的重要贡献，几乎每一章都引用他关于京剧的观点，第二章还专门把他与另一个京剧名旦汪笑侬的京剧生涯进行比较，指出欧阳予倩所写自传与戏剧理论文章为中国戏曲史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

欧阳予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艺术界一位集编、导、演、译、写等一身的“跨界”通才，他的戏剧理论与实践让海外学界看到了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由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10位成员合著的纪实文学作品《原来中国长这样》（四川人民出版社），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下主人公在中国的生活见闻及体验思考，以外国人视角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中德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体现。

这本书不是板着脸孔进行说教，而是贴近生活、直观亲切，通过10位德国学生讲述亲身经历，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大开眼界，这还只是开始。”这是曾留学于四川大学的德国青年潘昊琰在体验“复兴号”时发出的感慨，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最想说的话。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青年留学生在中国的求学生活，还可借他们的眼睛，看到集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制造、中国速度等多重内涵于一体“国际范儿”的中国。正如潘昊琰初来中国的感受，“当我们的飞机落地四川成都，立刻就被眼前的一切所震撼，规模巨大的机场、充满现代感的智能设施、目不暇接的海报等”，令他感到新鲜、新奇。同济大学德国留学生徐鸿羲也赞叹：“中国的科技让我大开眼界。使用网络，不管是下载学习资料，还是和远在德国的家人朋友视频通话，都无比顺畅，从来不用担心卡顿掉线。”当他听说深圳还有无人机送外卖，觉得简直太酷了。这些微小细节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感受，真实、真切，因而打动人心。

这本书以小切口讲大主题，运用多人多线叙事，以短篇故事实现轻量化传播，向全世界分享青年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原来中国长这样》分为4辑，即“缘分的种子”“七彩校园”“远方的家”“深读中国”，体现了留学生渐进式认识和了解中国、看见和体验中国、感受和读懂中国、爱上和书写中国的内在逻辑。我们可以从书中明显感受到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痴迷、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赞叹、对中国便捷现代生活的喜爱。留学北京大学的德国青年海洋，曾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参与并主持“中德青少年云合唱音乐会”，他在书中写下在安徽黄山感受到的诗意，在海南三亚冲浪看到的阳光明媚、海天一色的风景。海洋更以敏锐的感



倡导求真务实、不计名利的学风

——专家研讨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学术思想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严峻风范——严家炎、樊骏与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表示，严家炎、樊骏不仅是学术上的同行者，更是精神上的知己。他们共同参与编纂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奠定基础，并以“宁肯本色做实事，不愿苟且挂虚名”的风范，树立了学术人格的标杆。

“他们的学术不是封闭的书斋学问，而是与时代呼吸相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丁国旗认为，第二代学人自觉将个人研

究融入学科整体建设，其系统性的学术组织经验，对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贺桂梅用“实”“活”“知行合一”概括“严峻风范”，指出其核心在于扎实的学术回应真实的问题。她认为，这种治学态度恰恰是当代学术避免空心化、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一致认为，“严峻风范”不仅是严家炎、樊骏的个人品格，也是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共同的精神底色，代表着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展现了开拓进取、不计名利、薪火相传的学术追求。他们将不断启迪后辈拓宽视野、更新思维、深思细辨、严谨治学。

解开了中国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我已经知道山水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种象征。黄山迎客松的坚韧、挺拔，还有黄山日出、日落等自然景观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在中国文化中，都成为一种可以人格化的美好、坚毅、博大。”

这本书通过故事中的个体命运，折射出在华留学生群体的精神追求。这10名留学生的经历不同，感受也不一样。潘昊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细心和友善”；海洋决心“充当德中友好交流的筑桥人”；孔浩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条件艰苦的地方支教，最深的体会是中国百姓的善良；习惯了德国“注重秩序和严谨”的马云天，更喜欢中国在秩序和严谨中“充满热情和活力”；对电子支付印象深刻阿芷若相信“将会有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来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大家背景不同，怀揣着各自的梦想来到同一个地方，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通过海洋的话，让我们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在的生活，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克服语言学习的重重困难，有的还参与与中国科技前沿的多个研究领域，这种精神令人感动。正如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团长张云刚所说，这种交流，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的交流，更是心灵的碰撞。每一种真诚的了解和融入，代表着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可能。

纪实文学《原来中国长这样》聚焦外国留学生群体，用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言说真实立体的中国。这本书的写作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交流实践。

系统梳理鲁迅在韩传播与研究状况

——评《鲁迅与现代韩国》

葛涛

统、深入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40年代，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将鲁迅的作品翻译成朝鲜语，并开始研究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柳树人、李陆史、李明善等都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20世纪20年代—40年代，鲁迅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研究也被称为韩国鲁迅研究的前史，但相关情况长期以来缺乏系统性研究。洪昔杓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20年代—40年代的报刊文献中搜集史料，以时代为序，选择对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作出贡献的代表性知识分子进行个案研究，遴选出20世纪30年代的翻译家梁白华、记者申彦彦、教授辛岛骁、作家李陆史、批评家丁来东和金台俊等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鲁迅与现代韩国》分析了梁白华《阿Q正传》译本的特点和价值，剖析了丁来东和

金台俊鲁迅作品研究的不同路径，梳理了《东亚日报》驻沪记者申彦彦和学者辛岛骁两人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两人对鲁迅思想的传播与研究。《鲁迅与现代韩国》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分析，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韩国鲁迅研究的空白，而且对研究鲁迅作品与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也作出贡献。

《鲁迅与现代韩国》的另一特点是重申鲁迅作品在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洪昔杓是韩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鲁迅研究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强调：“于我来说，鲁迅文学并不仅仅是我深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媒介，更是我理解中国文化根基的重要文本。鲁迅不仅仅是研究对象，还是帮助我摆正学习态度的楷模，更是我的精神导师。”由此可见，洪昔

杓将生命体验和精神追求灌注到自己的鲁迅研究工作中。在论及鲁迅在东亚的价值时，作者说：“真诚希望中国读者能通过这本书，了解韩国文人对鲁迅和鲁迅文学的热爱……鲁迅文学是‘仍旧鲜活’的文学文本，彰显着不竭的影响力。基于此，我认为鲁迅文本可以成为推动东亚各国关系、谋求中韩乃至中韩日相互理解和对话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宗旨所在。”洪昔杓是带着浓厚的现实关怀来撰写《鲁迅与现代韩国》一书的。

《鲁迅与现代韩国》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现实意义：东亚各国鲁迅研究者携起手来，以鲁迅研究为媒介推动东亚各国文化交流。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

中华诗词学会成立诗书人才扶持工作委员会

本报电（曹晶）近日，中华诗词学会诗书人才扶持工作委员会（下称“双扶工委”）在京成立。双扶工委以“扶持诗书人才”为目的，以“诗书两扇门，经典育根深。若使三观正，文明要铸魂”为宗旨，着力培养诗词书法复合型人才。

自古以来，诗词与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扶工委的工作主要聚焦于青少年诗人与青少年书法家的培养，积极发掘诗词与书法领域的优秀新人并予以重点扶持。未来将通过推动作品集结成册、举办专题展览等方式，为青少年诗人与青少年书法家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与窗口。此外，双扶工委还将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加强青少年诗书艺术培训，鼓励年轻创作者积极参与各类诗词、书法大赛，在切磋琢磨中早日成才。

大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了由双扶工委与中国文艺基金会吴震青少年诗书艺术培训、鼓励年轻创作者积极参与各类诗词、书法大赛，在切磋琢磨中早日成才。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昔杓的著作《鲁迅与现代韩国》中文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国内鲁迅研究界的关注。该书是第一本系统全面研究鲁迅与现代韩国关系的专著，代表了当代韩国鲁迅研究的学术水平。与此同时，其中文版的面世对于促进中韩两国鲁迅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也具有积极意义。

《鲁迅与现代韩国》对鲁迅在现代韩国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了系